

MONEY AND POWER
IN THE MODERN WORLD

1700-2000

金钱关系

现代世界中的金钱与权力



[英]尼亞爾·弗格遜著 蒋顯環 译

THE

CASE

NEW

东方出版社

金钱关系

现代世界中的金钱与权力

(1700-2000)

[英]尼亞爾·弗格遜著

蔣顯璟 译

策 划 杨松岩
责任编辑 申 琥
装帧设计 曹 春
版式设计 东昌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钱关系——现代世界中的金钱与权力(1700—2000)

[英]尼亞爾·弗格遜著 蒋顯環譯. 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8

ISBN 978 - 7 - 5060 - 2866 - 0

I. 金… II. ①弗… ②蒋… III. ①经济-研究-世界-1700 ~ 2000 ②国际政治-研究-1700 ~ 2000 IV. F112 D5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9758 号

THE CASH NEXUS

copyright © Niall Ferguson, 2001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Niall Ferguson 授权东方出版社独家出版。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 - 2005 - 1196 号

书 名 金钱关系——现代世界中的金钱与权力(1700—2000)

JINQIAN GUANXI——XIANDAI SHIJIE ZHONG DE JINQIAN YU QUANLI
(1700 - 2000)

作 者 [英]尼亞爾·弗格遜著 蒋顯環譯

出版发行 東方出版社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开 本 640 毫米×980 毫米 1/16 印张:25.5

字 数 380 千字

印 数 5000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60 - 2866 - 0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邮购电话 010 - 65250042 65289539

定 价 46.00 元

作 者 简 介

尼亞爾·弗格遜是哈佛大學國際歷史教授、牛津大學耶穌學院高級研究員、斯坦福大學胡佛學院高級研究員。他是《紙與鐵：羅斯柴爾德家族》（兩卷本）、《戰爭的遺憾》、《金錢關係》、《帝國》和《大國》等書的作者。他也是《虛擬歷史》的編輯。他與妻子和三個兒女居住在牛津郡。

THE CASH NEXUS 金錢關係

“弗格遜身兼使統計數據翩翩起舞的能力……和對文學與歷史的旁征博引……《聖經》說：‘金錢萬能’，但是，正如弗格遜以如此深厚的學養所證明的那樣，金錢並不完全是萬能的。”

——馬丁·瓦達·魏爾，《文學評論》

“才華橫溢。”

——羅利·奧多納爾，《愛爾蘭時報》

“弗格遜无论写的是什么都极为有趣。在《金錢關係》中，他探讨了也许是现代历史中最强大的一种力量。”

——麥爾文·布拉格，英國廣播公司“歷史”節目

“這本書淵博高尚……是一則受歡迎的警言，可預防對時尚的必勝信念者那天真的預期。”

——大衛·卡利奧，《紐約時報》

“弗格遜始終分析透徹、引人入勝、十分投入。”

——詹姆士·大衛遜，《每日電訊報》

“《金錢關係》不僅具有獨創性，而且有很深的研究。”

——丹尼爾·葉爾金，《華爾街日報》

“這本書是對過去三百年中金錢與權力互相影響的严谨歷史研究。”

——約翰·格雷，《新政治家報》

“尼亞爾·弗格遜挑戰了關於金錢與權力的一些重要信念……這本書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並且研究得極為透徹。”

——比爾·詹米遜，《蘇格蘭人報》

“弗格遜最伟大的成就，就在于用本书中的叙述使我们重新思考金錢与权力之间的联系。”

——肖恩·庫蘭，《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

策 划 杨松岩

责任编辑 申 琦

装帧设计 曹 春

THE
CASH
NEXUS
金钱关系

“在这个复杂的时代里……现金偿付是人与人之间唯一的关系……现金偿付是唯一的关系吗？可却有那么多东西是金钱买不来的！金钱是个大奇迹，但它在天堂不是万能的，连在凡间也不是……”

——托马斯·卡莱尔，《宪章主义》（1840）

金钱崇拜的福音……也有其相应的天堂。因为在繁多的幻象中有一件事是真实的：我们对一件事是十分认真的：那就是赚钱……我们在哪里都彻底忘记了这一点：现金偿付并非人与人之间唯一的关系。

——托马斯·卡莱尔，《过去与现在》（1843）

资产阶级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留下了赤裸裸的自私自利，还有冷漠的“现金偿付”。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

搞科学的人告诉我们，海员们在海上的一切冒险、部落和种族的一切倒行逆施，弄得尘土飞扬、谣诼四起，混淆了一切历史，其起因都不是什么奥秘的东西，无非是供应与需求定律，还有某种追求便宜配给的天生本能。对任何进行深刻思考的人来说，这显得是一种乏味的可怜解释。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作坊的意志》（1878）

目录

引言 旧的经济决定论及其新版 (1)

第一部分 开支与征税

第1章 战争国家的兴衰	(23)
第2章 令人痛恨的税收	(49)
第3章 平民与贵族：代议制与政府	(75)

第二部分 许诺还债

第4章	月球之山:国债	(103)
第5章	货币印刷者:不履约与贬值	(135)
第6章	论利息	(161)

第三部分 政治经济学

第7章 沉重债务和食税者:金融的社会史	(185)
第8章 感觉良好因素的神话	(212)
第9章 银桥综合征:选举经济	(239)

第四部分 控制全球的力量

第10章	主宰者与偷生者：金融全球化	(265)
第11章	金镣铐与纸锁链：国际货币体制	(300)

第 12 章 美国浪潮:民主的兴衰沉浮	(324)
第 13 章 统一破裂	(352)
第 14 章 扩展不足:经济力量的局限	(369)
结论	(397)
译后记	(404)



2 金钱关系 > > > > > > > > > > > > > >

引言

金钱推动世界，我们都很明白这一点。

——《卡巴莱夜总会》(1972年)

“金钱推动世界”，音乐剧《卡巴莱夜总会》中司仪这样唱道。这个概念由来已久，但却历久弥新。《圣经》中早有这种说法，《新约》和《旧约》中也都有。比较一下“金钱万能”（《旧约·传道书》10:19）和“爱金钱是万恶之源”（《新约·提摩太前书》6:10）吧。当然，摩西律法谴责了贪婪之罪。但在基督教教义中，正如第二条格言所暗示的那样，即便是正常的赚钱动机也被谴责。基督宣教的革命性吸引力之一部分，就是富人将被排除在上帝国门之外：“富人进天堂，要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新约·马太福音》19:24）

显而易见，若是这条教义吓得人们不敢赚钱，那么西欧就不会如此顺利地从封建主义发展到资本主义了。关键就是，这条教义根本不起作用。相反，它安慰了那些（大多数）没钱的人，同时又给那些太有钱的人灌输了一种罪孽感：对一个既网罗大众信徒、又寻求精英阶层大笔私人捐款的宗教组织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战略。

道德与财神水火不容的概念也影响了现代最成功的“世俗宗教”。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看来，他们的自身阶级——资产阶级——令人厌恶的地方就是“赤裸裸的自私自利”和“冷漠的‘现金交易’”。当然，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部矛盾会加速其自身垮台的断言被认为是科学的和客观的。正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可阻挡的兴起推翻了封建贵族

秩序,反过来,工厂里贫穷而巨大的无产阶级的形成不可避免地会摧毁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马克思蔑视他祖先的宗教信仰,对他父亲所改信的路德教也很冷淡。但是,马克思若没有描述一幅以预言革命的形式出现的世俗审判日的前景,就不会赢得那么多的追随者。在这幅未来前景中,富人必将得到报应。正如以赛亚·伯林所评论的那样,《资本论》中最振聋发聩的地方,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的手笔:他“以古代希伯莱先知的方式……提出选民的名字,宣布资本主义的重任,预言这邪恶制度的末日,描述那些看不见历史进程和目标、从而要自我毁灭、被判决受清算的人将受到的惩罚。”众所周知,马克思受过黑格尔、李嘉图和法国激进派的影响。事实上,就是托马斯·卡莱尔在他的《宪章主义》(1840年)一书中首创了“金钱关系”一词,但马克思展望的是一个未来无产阶级社会,而卡莱尔惋叹的却是一个被理想化的中世纪英国的消逝。

虽然这不再是时尚的做法了,但还是可以把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魔戒》阐释为对资本主义的又一个浪漫批判。正如第一场里莱因河畔少女之一告诉矮人阿尔伯里希的那样,其中心论点就是:金钱——确切说就是挖出来加工过的金子——就是权力:“那个用莱因金子造出魔戒的人/会从魔戒得到无穷威力/他能为自己弄到全世界的财富。”但是有一个难题:“只有那放弃爱情力量的人/只有那丢失爱情欢乐的人/只有他才能获取魔术/来把金子打造成魔戒。”换句话说,发财和满足情感是互相排斥的。阿尔伯里希起初色迷迷地向莱因少女求爱,却被嘲讽拒绝,所以选择金钱就没什么难处了:意味深长的是,《尼伯龙根魔戒》中资本积累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他盗窃金子。

这不仅仅是《尼伯龙根魔戒》中的第一个经济象征。下一个场景中，主要情节就是沃坦神与巨人法夫纳和法索尔特之间关于合同的纠纷。这两个巨人刚刚盖完了一座新城堡瓦尔哈拉。然而，就是在第三场里才有最露骨的经济学。在这一场里我们看到阿尔伯里希摇身一变成了尼伯尔海姆的狠心主人，毫不留情地迫使他的矮人同伴尼伯龙们在一个巨大的炼金厂里流血流汗。他那悲惨的兄弟麦姆解释道，自己



的矮子族曾是“无忧无虑的金匠”，“为我们的女人打制首饰，奇妙的小饰物，/尼伯龙人精巧的小物件，/轻松地笑掉工作的疲劳”。但“现在这个坏蛋却迫使我们/爬进矿洞里去/只为他一人苦干……没有消停或安宁。”阿尔伯里希要求工人不停歇地干活，铁锤敲打砧子的节奏声令人记忆深刻，象征着工作速度。在这个组歌中，我们稍后还会听到这个声音，那是西格弗里德在重新锻造他父亲破碎的名为诺同的大刀：这也许是武器制造被破天荒地谱曲的唯一例子。

当然,如今愿意夸大《尼伯龙根魔戒》中经济主题的严肃的瓦格纳研究者是不多了。1976年在贝罗伊特的演出中显得有新意的东西,到了1991年就是老调了。在那一年,考文特花园里的一场演出中阿尔伯里希戴上一顶高帽,而西格弗里德穿着工人的蓝色劳动服。另一方面,瓦格纳本人把烟雾弥漫的伦敦与尼贝尔海姆拿来做比较。他首先构思了革命的1848年里的周期,之后不久就奔赴德莱斯顿,与无政府主义者米凯尔·巴枯宁同住兵营(两人在那里为了消磨时光,就为一出计划中的歌剧《拿撒勒的耶稣》勾画了亵渎神圣的钉十字架场景),他这么做是意味深长的。1876年秋,谱写完毕的《魔戒》首演,那时瓦格纳肯定早已摆脱了年轻时的激进政治观。但对刚满20岁的年轻爱尔兰作家肖伯纳来说,瓦格纳歌剧中话外的经济意义仍是清晰可辨的:人们甚至看到他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边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法译本,边研究《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乐谱。对肖伯纳来说,《魔戒》是则阶级制度的寓言:阿尔伯里希是个“贫穷、粗野、俗气、下流的家伙”,他企图“加入贵族社会”但被“嗤之以鼻,明白了他只有当上百万富翁才能期望把那个社会踩在脚下,并买个美丽文雅的妻子。他被迫做出选择。于是,如同千万人每天都在那样做,他放弃了爱情,不久他就把金子捞到手了。”

瓦格纳的综艺作品的要害，就是诸神一偷走魔戒时，阿尔伯里希对魔戒的诅咒：

既然是金子给了我无穷的力量，
现在不管是谁戴着它，

小丑就让它的魔力给他带来死亡！“最曾戴于魔物
王冠”……不管谁戴上它都会忧烦无尽，小丑戴上它，
不能戴上它的人都会嫉妒钻心！大家都会渴望拥有魔戒，
可谁都从中得不到欢乐！拥有它的人会徒劳地守护它，
因为他会从中碰到他的刽子手！

在《诸神的黄昏》中，西格弗里德被杀，这个诅咒最终应验了。在这一幕的结尾，布吕恩希尔德跳进他的火葬堆，把魔戒扔回了莱因河中，并把“瓦尔哈拉”的高塔烧着，但这场熊熊大火几乎无法在舞台上表现出来。无独有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里也预见到资本主义的类似下场——这部著作若在审美上略逊于《魔戒》的话，在鸿篇巨制上足可以与之匹敌。在第32章中，马克思令人难以忘怀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

个人的与分散的生产工具被转变为社会集中的生产工具，因此也就是把许多人侏儒般的财产转变为少数人的巨人财产，剥夺人民大众的土地所有权，剥夺他们的谋生之道和劳动工具……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史前史……靠本人挣来的私有财产……被资本主义财产取代，后者依赖于对外来的，以前是自由劳工的剥削。侏儒与巨人的意象至少是很有暗示性的。另外，像瓦格纳一样，马克思也预见到清算的一天：

随着篡夺与垄断这一转变过程的利益的资本主义巨头人数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破败和剥削的总量也日益增长；但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在增长，这个阶级的人数在不断增加，被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机制所培训、团结和组织起来了。资本的垄断成为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劳工的社会化达到一个极点，以至于它们变得与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相容了。这层外壳被绷破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丧钟被敲响了。剥夺者被别人剥夺了。

后来德国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奥古斯特·倍倍尔曾预言：“资产阶级世界诸神的黄昏”，从而把这一类似处说得很明白。

借用瓦格纳的另一个术语，即一场即将来临的激变的概念，是 19 世纪文化中大主题之一，绝非政治左派的独家财产。在更小的规模上，经济现代化的后果——分崩离析的主题——在 19 世纪文学中反复出现。在西奥多·冯塔纳出版于 1899 年的怀旧小说《施泰希林》中，格罗布索夫本地的玻璃厂象征着勃兰登堡公地古老的乡村秩序即将垮台。正如老容克贵族杜勃斯拉夫·冯·施泰希林所哀叹的那样：

他们……把[他们生产的蒸馏器]送到别的工厂去,然后他们就立即用这些绿瓶子蒸馏各种可怕的东西:盐酸、硫磺酸、冒烟硝酸……不管是亚麻布、棉布还是皮革,什么东西滴上一滴就会烧个洞;什么都会被烧坏,被烧焦。一想到我们格罗布索夫人也参与进去了,欢天喜地地为这场世界大火添柴加薪,啊,先生们,我就痛苦万分。

把资本主义与分崩离析联想起来，这还不仅只是德国的特色。在狄更斯的小说《董贝父子》中，穿越伦敦的铁路是毁灭与死亡的险恶代理人。在佐拉的小说《金钱》中，一家银行的兴衰就是路易·拿破仑第二帝国腐败的象征。莫泊桑的小说《俊友》也以类似的笔调描写了第三共和国时期一个帅气年轻人的堕落：在这里一切人际关系都受股票交易所的操纵。

这种局面也许并不完全出人预料。专业作家作为一个职业团体，

一直都对经济进步带来的利益表现出明显的不感恩戴德。而其中一项很大的经济利益就是印刷文字市场的大扩张。冯塔纳、狄更斯、佐拉和莫泊桑都是这种扩张的受益者，但瓦格纳还得依赖艺术家的传统资助：皇家恩庇。

当然，现实就是，在19世纪下半叶，世界大部分地区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连马克思也抵挡不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经济繁荣的诱惑。此外，当社会主义革命最终来临时，它所影响的不是最先进的工业化社会，而主要是像俄罗斯与中国这样的农业社会。但是，马克思与卡莱尔、瓦格纳和维多利亚那一代中许多其他人所共有的浪漫思想，即世界签订了某种浮士德般的契约——工业化要以人类堕落并最终以“全世界大火”为代价——然而资本主义却在1848年以后还有市场。汗牛充栋的历史书籍既是唯物主义的，又在内心是浪漫主义的，它们都是立足于这个设想：资本主义经济有根本性的错误；少数有产阶级与贫困大众的利益冲突是不可调和的；某种革命性的危机将带来新的社会秩序。

今天历史学家仍在探讨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1848年革命失败后许多激进分子所提出来的：为什么资产阶级宁愿要专制贵族政权而不要工人与手工业工人运动？（在理论上）他们至少是可与后者建立共同事业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提出的回答就是，只要中产阶级的经济抱负不受阻遏，他们就乐意放弃他们的政治抱负，让旧政权仍然掌握大部分实权，以换取保护，使他们不受威胁日增的无产阶级的侵害。这个模式的影响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历史学家一直用马克思主义概念做研究的典型方法（虽然他们自己不是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提出在1870与1880年代的“大萧条”与当时大部分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脱离贸易自由主义而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之间的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也经常被解释成一种资本主义的“世界大火”（Generalweltanbrennung），是帝国主义竞争不可避免的后果。根据死后影响颇大的德国历史学家艾克哈特·柯尔（Echart Kehr）之见，魏玛时期德国为何打两条战线的战争，原因就在于普鲁士重农主义



者想要关税，得罪了俄国；而重工业家想要海军战舰订单，得罪了英国；而这两派都想通过“社会帝国主义”的战略来反击社会民主党的进展，就得罪了这两个国家。虽然对这一方法的次要部分有不少修补，但其影响今天还是可以看到的。

马克思模式的最大好处就在于其简单性。用辩证唯物主义武装起来的历史学家，比听从兰克（Ranke）劝导，努力就每个时代本身情况来理解它的历史学家，能研究更大的课题和更长的历史时期。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篇幅最大的两部历史著作是马克思主义者写出来的，个中意义深长。伊曼纽尔·华伦斯坦的《现代世界制度》和艾里克·霍布斯堡姆的四卷本现代世界历史，直到1994年才得以完成。在最后一卷《极端主义时代》中，霍布斯堡姆企图为他那一代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求得几分安慰，论证说，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资本主义之所以免于崩溃，是因为斯大林的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救了它。而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解体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暂时挫折。霍布斯堡姆承认，国有制度与中央计划在俄罗斯可能是失败了，但是“几乎不可怀疑”的是，“马克思仍然作为一个重要思想家而存在”；而“毫无限制的自由市场”学说则因为撒切尔主义“公认的经济失败”而同样被证明行不通了。此外，人口与经济对全球环境的压力已经在为一场“不可逆转的危机”铺平道路了。可持续发展“与立基于经济企业对利润毫无节制的追求的世界经济”是不相容的，“这些企业就其定义来说，就是致力于这个目标，并在一个全球市场上竞争”。日益扩大的贫富国之间的差距也在“积累起来的麻烦”。正如在发达经济国家中贫富个人间差距在日益增大一样，最终会使得有必要让国家恢复对经济的控制：“对资源的非市场性分配，或至少（原文如此）对市场分配无情的控制，这对预防即将到来的生态危机是至关重要的……人类的命运……将取决于恢复公共权威。”

霍布斯堡姆也无法避免地以 19 世纪 40 年代熟悉的末世论话语做出结论：

国英影响了本世纪的历史势力继续在发挥作用。我们生活于其中，这个世界被资本主义发展那巨大的经济和科技过程所俘获、被其连根拔起，被转化……我们知道，或者至少这么假设是合乎情理的，即这个过程不能无限地进行下去……有迹象表明……我们到过了一个历史危急时刻。科技经济所产生的力量现在大得足以摧毁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人类社会结构本身……正处于被摧毁的时刻……我们的世界既有外爆又有内爆的风险……变革社会的另一个选择就是黑暗。

这段话让人们很难不联想到《边缘之外》那出短剧，在剧中彼得和他的追随者们一周又一周地徒劳地准备好迎接世界末日。

然而，马克思的预言虽然令人瞩目地没有实现，却并不需要使这个基本观念失去可信度：即金钱——经济——推动世界运行。我们需要的就是抛弃圣经中认为世界末日迫在眉睫的设想，并把现代经济史重新塑造为资本主义胜利的故事。

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布拉德福·德龙即将出版的20世纪史中，他所撰写的可能会是新的经济决定论的一份关键性文本。这本书肯定是对《极端主义时代》的抗衡。德龙的20世纪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自由与繁荣的故事”，在这个世纪中，极权主义的极端行径像是两个温和的全球增长时代之间错误的巨大历史性转向。然而，书中根本性的假设就是——经济变革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这一假设与霍布斯堡姆的差异不大。根据德龙之说，

20世纪的历史总体来说就是经济史：经济是事件与变革的主要竞技场，经济变革也是生活中其他领域里变革的推动力……经济变革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致从根本上动摇了历史上其他的领域。



也许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制造与消费日常生活必需品、使用日常生活的便利，还有生产、消费和分销商品成为整个世纪历史的推动力。

即便是世纪中期的独裁政体也都“起源于经济上的不满，在经济意识形态中表现出来。人们成百万地互相杀戮，就是为了决定该如何组织经济生活。”德龙甚至于用经济观点来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假如没有希特勒那疯狂的偏执念头——德国人若要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就需要更好的土地—劳力比——即更多‘生存空间’，就很难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会发生。”但是，这些是错误的意识形态，是大萧条时期灾难性管理经济政策的畸形产儿。只是在 20 世纪最后一个年代里，由于苏联共产党的垮台以及全球都接受了自由化市场，历史才恢复了 1914 年前上升的轨迹。

德龙宣称，现代历史主要的政治事件可以用经济观点来解释。这种做法有显赫的家谱。这一观点也得到广泛的公众支持，尤其是在美国，在那里这种经济决定论几乎就是常规性的智慧。在本书后面，我将详尽地阐释这一思想的不同版本；在此阶段，概述一下三种典型的假设就足够了：

一、经济增长促进民主化(而经济危机则产生相反的效果)。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社会科学家赛穆尔·马丁·利普塞特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的著作中，而且在最近像罗伯特·巴罗等政治科学家的许多研究中也得到广泛的支持。巴罗发现，经济繁荣与体验民主的倾向之间有很强的正面关系。用另一位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的话来说，就是“一个社会中公民的生活水准若上升，那么这一社会就更可能更开放、更宽容、更民主。而生活水准如果停滞不前，那么这个社会就可能向相反方向移动。大部分读者会想到的就是个最明显的反面例子：可以在数不胜数的教科书中找到的因果关系——大萧条导致希特勒上台与法西斯的普遍兴起，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下面是这一论点的一个典型例子：

欧洲经济危机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内政治与社会紧张局势加剧，使希特勒在德国上台，鼓励别处法西斯运动的发展……但是，经济危机也是一场世界危机……特别是对日本经济来说，丝绸出口损失的灾难性后果，以及对日本农民及其家庭所引起的毫无疑问的困窘。这一切都促使日本军队采纳了新的扩张政策。

二、经济成功保证再次成功竞选(而拙劣的经济业绩则导致竞选失败)。根据一个政治科学学派的理论，选民在选举时的首要动机，就是他们的经济体验和前景。用赫尔穆特·诺泼斯的话来说，就是“经济投票……在民主国家的公民头脑中根深蒂固。”这使得很多政客把连任希望寄托在“感觉良好因素”上：即相信一个政府是否得民心，在于其经济业绩如何。这一理论的一个流行版本说明了克林顿为什么在1999年的弹劾案中没有下台，其原因就是美国股市持续飙升。1992年克林顿的竞选口号——“蠢货，经济才是硬道理”——成为这一理论的某种缩略版本。

三、经济增长是国际势力的关键(但是太大的国际势力可能会导致经济衰退)。在《强国的兴衰》一书中，保罗·肯尼迪论述道，经济学为国际关系史提供了答案：“世界军事强国之间平衡的所有主要转移都尾随在生产平衡之后……胜利总是归属拥有最大物质资源的一方。”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得胜盟国总是具有压倒优势，因此这一假说初看起来很有说服力。即便是肯尼迪随后的话——“所有强国最终都会因扩张无度而衰竭，因为他们日益增长的军费开支开始破坏他们的经济实力”——也不像人们有时所想的那样容易质疑。虽然人们会忍不住嘲笑肯尼迪关于美国在苏联垮台后不要扩张无度的警告，但他却可以言之有理地论证，说美国听从了他的建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大幅度削减国防开支。他的分析也没有排除苏联因扩张过度先垮台的可能性。相反，《强国的兴衰》刚出版时，细心的读者会做出推论，认为苏联最接近垮台的边缘。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1989年也许遭到挫折，但经济决定论却没有。所发生的一切就是，征象逆转了：是计划经济的停滞使苏联体制灭亡，而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功却保证了民主的

